

云龙澜沧江流域清—民国墓葬碑刻语言考释

张 满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DOI: 10.65285/RWYSHKX.V2I4.018

摘 要: 云龙县清代至民国墓葬碑刻遗存丰富, 是研究地域文化与民族交融的珍贵民间书面语资料。本文以澜沧江流域多处墓葬碑刻为研究对象, 运用语言接触相关理论考释地方史事, 补证白族迁徙脉络, 揭示了汉白民族双向交融的特征, 为民族接触地带语言融合研究提供了实证参考。

关键词: 云龙县; 墓葬碑刻; 民族交融; 碑刻语言; 民间书面语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nguage of Tomb Inscriptions in the Yunlong Lancang River Basin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Man Zh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Yunlong County is rich in tomb inscriptions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hich are precious folk written languag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regional culture and ethnic integration. This paper takes multiple tomb inscriptions in the Lancang River Bas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e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language contact to interpret local historical events, supplements the migration context of the Bai ethnic group,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way integration of the Han and Bai ethnic groups, and provides an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tegration in ethnic contact areas.

Keywords: Yunlong County; Tombstone inscriptions; Ethnic integration; Epitaphic language; Folk written language

前言:

墓葬碑刻作为民间书面语的重要载体, 相较于官方文献, 更能真实反映地域语言的实际使用状态, 是研究民族接触地带语言变异的重要材料。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方面: 碑刻文献价值与研究脉络、民族文化交融、断代语言特征、遗产保护与整理。云龙现存清—民国时期的墓葬碑刻很多, 本研究主要聚焦澜沧江流域的碑刻, 含功果桥镇五台山墓葬群、苗尾乡烧坝村、三岔村、瓦窑墓葬群及下坞村李氏墓葬群, 碑刻时间跨度从清乾隆至民国三十八年, 涵盖杨、李、欧等多个宗族, 形制包括墓志、对联、匾额、赞语等, 内容涉及逝者生平、宗族评价、地域文化等, 语料类型丰富且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征。

白语文献研究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一批经典碑刻成为白汉接触研究的重要参照。大理国时期的《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作为早期官方汉文碑刻, 为考察白汉语言的早期互动提供了历史依据; 明代杨黼所撰《山花碑》作为方块白文的典范之作, 是研究白语书面传统与白汉文化融合的标志性文献; 《赵坚碑》《故善士杨宗碑》《杨寿碑》等明代民间墓志, 则集中反映了明代白族民间碑刻的双语书写特征, 为后世白汉接触碑刻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 杨益清^[1]、简启贤^[2]等学者对云南古代碑刻的辑录与考释, 王锋^[3]、赵敏^[4]等学者对白文发展、白语祭文的调查与研究, 谢潇^[5]、杨正文^[6]等学者对滇西地方历史、

汉文文献民间传播的探讨, 均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与研究视角。

一、云龙墓葬碑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 历史与族群状况

云龙县的族群构成与迁徙历史, 为白汉语言接触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背景。据《云龙县志》记载, 白族是云龙县的世居民族, 早在唐代便已在此定居, 主要分布于诺邓镇、宝丰乡、功果桥镇(原名旧州镇)等县域核心区域, 形成了深厚的地域文化根基^[7]; 汉族大规模迁入云龙始于明代“洪武开滇”, 在明清“改土归流”政策实施后形成移民高潮, 迁入的汉族主要分布在坝区与交通沿线, 与当地白族逐渐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族群分布格局。

(二) 文本基本特征

从现存南诏大理碑刻文本形态来看, 传世金石文书以汉文为主体载体, 同时穿插方块白文、梵文、少量古藏文三类文字体系; 其中汉文用于官方政令、大型碑记, 白文多零散标注在人名、地名、度量用词中, 梵文集中见于各类造像题记与塔幢铭文^[8]。本次研究的40余通碑刻在书写语言与字体运用方面呈现出显著共性与少量个性特征。所有碑刻多以汉语文言文作为主要书写语言, 遵循了汉语书面语的基本规范, 仅部分民国时期的碑刻, 出现少量白话表述, 体现了近代汉语从文言向白话形式演变的时代特征。

二、云龙墓葬碑刻语言的接触考释

(一) 词汇层面

词汇是语言接触中最直接、最活跃的层面，云龙清代至民国墓葬碑刻以汉文书写为主，却在亲属称谓、地名、民俗特色用语等方面大量保留白语特征。亲属称谓是用来表示亲属关系的名称，是语言接触中最稳定、最具族群标识性的特征之一^[9]。在云龙白语里，“阿”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亲属称谓前缀，其语音形式为 a⁵⁵，主要用来构成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称呼，也广泛用于日常人名，构成“阿+名”的结构^[10]。比如把父亲叫作 a⁵⁵li⁴⁴（阿爹），母亲叫作 a⁵⁵mo⁴⁴（阿妈），苗尾乡《李万夫妇墓》碑文载有“直朴严父李万、柔顺慈母阿凤”等表述，其中“阿凤”一名，可视为白语 a⁵⁵ 称谓前缀在汉文碑刻中的一种体现。在苗尾乡、功果桥镇等白族聚居区域的墓葬碑刻中，“阿秀”“阿莲”等以“阿”为前缀的称谓亦较为常见。此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白语称谓习惯已较为普遍地进入汉文碑文的词汇使用体系，可作为汉白两种语言长期接触、相互影响的例证之一。

地名是由专名与通名共同构成的专有名词，具有稳定性强、地域标识鲜明的特点，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地域族群历史与语言融合的面貌。云龙县澜沧江流域属少数民族聚居区，不少地名源自白语，保留了白语的语音、语义与构词特点，在墓葬碑刻中频繁出现，是汉白语言接触在专有名词层面的重要体现。如“瓜拉箐”属白语地名音译，国际音标 kua⁵⁵la⁵⁵xou²¹，“瓜拉”kua⁵⁵la⁵⁵为白语固有词，意为蕨菜，该地名以自然植被与地形特征命名，本义为长有蕨菜的山谷^[11]；“私栗树”sɿ⁴⁴li³¹ʈɿ⁵⁵，“私栗”为白语，意为棠梨、野梨，“树”为汉语借词，该地名本义为长有棠梨树的地方。部分地名在汉字转写过程中采用音义兼顾的方式，形成汉白融合型专有名词。

除亲属称谓与地名外，碑刻中还出现一批具有白语底色与滇西地域特色的词汇，多见于丧葬礼仪、宗族评价、德行溢称、赞语称颂等语境。这类词语以汉字书写，符合汉语书面语基本规范，但在使用频率、搭配习惯与语义侧重上区别于中原官方文献，呈现出鲜明的民间书面语特征。如德行评价类的诚慤、慈和、淑慎，丧葬委婉语佳城、寿堂、千秋域，赞语称颂类的瓜瓞绵绵、芝兰郁茂、垂裕后昆、棠棣芳盛，以及具有地域标识的崇山、沧水、五台山等，均在云龙墓葬碑文中高频出现。这些词汇既受汉文化礼制传统影响，又与白族社会习俗、价值观念及地域语言使用习惯高度契合，虽未脱离汉语系统，却因白语使用习惯与地域文化浸润，形成独具一格的词汇面貌，是白汉语言接触在日常用语与民俗表达层面的真实反映。

(二) 句式层面

句式与韵律是语言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言接触中最易发生变异的层面之一。研究中发现碑刻对联和赞语整体沿用汉语文言句式，但受白语表达习惯影响，格律脱离中原传统范式。正统对联讲究平仄相间、仄起平收，

而《杨春富墓》“文峰多毓秀，吉地常钟灵”下联末字平声落脚，打破汉语传统格律定式。另有“崇峰腾龙甲，沧水起文波”“千古树木千秋秀，一堂祖孙一堂香”等对联，普遍重对仗表意、轻平仄声律的出现。从语言接触理论来看，当两种语言长期共生互动时，强势书面语的形式框架会被保留，而韵律、节奏等底层特征易受本土语言习惯影响而发生适应性改变，云龙碑刻的句式变异正是白汉语言长期接触、双向调适的典型表现。

三、云龙墓葬碑刻语言的文化考释

云龙澜沧江桥梁的营建史，是区域社会变迁、国家边疆治理与民族精神凝聚的重要物质表征。清代同治年间兴建的飞龙桥，在下坞村（丫口）《李国栋墓》中留有直接记载。墓主李国梁碑文言：



候至甲子年，分有浪穹附生李公前来镇守云龙，莫大功果，始造沧江之桥，余在修桥局内承充书办，甚是留心，并未克虐匠役，监工各项九年有余。

此段记述清晰表明：甲子年（同治三年，1864年）云龙启动澜沧江桥梁工程，墓志所记“附生李公”，据《云龙县志》与飞龙桥原碑可确证为李玉树。李玉树，字桂楼，云南浪穹（今洱源）人，杜文秀元帅府大翼长，同治元年（1862）率兵总镇云龙，同治三年（1864）主持建成澜沧江飞龙桥，为云龙境内第一座铁链桥。其亲撰《新建飞龙桥碑记》自述奉命总镇云龙，安抚黎庶，桥名由杜文秀赐“飞龙”，取利济苍生之意，而墓主李国梁以修桥局书办身份参与监理长达九年。墓志所载“修桥局”“书办”“监工”等内容，与地方志、碑铭所载建桥史实、人事结构相互印证，可资考证清代滇西边疆交通营建与治理实况。该桥即清代滇西重要交通设施飞龙桥，它的修建既是滇西边疆开发的标志性工程，也是汉白民众协作共建、文化深度交融的历史见证。

然而与桥梁遗址相对清晰的历史脉络不同，散存于乡间的古代碑刻现面临着日渐损毁的困境，令人扼腕。如下坞村李氏墓葬群李公墓，因年代久远、风雨侵蚀，碑文已破损严重，诸多文字漫漶不清，大量历史信息濒临消失。

其现存可辨识文字仅为(□代表碑文字体残缺,无法释读):

□月三十日午□毓秀□

□习时,诗事父兄,钊克孝克弟虞□中人也,勤俭成基,谦和世故,继德之齐齐,臻亦禎祥□屡集□大风□,氏之三绕膝皆龙,不亚笋家,之八重孙秀出,龙角挺生,卜他年,瓜瓞绵绵,绍方□之奕尊,看今日子孙振振,发兰室之英华,《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斯之□谨序。



碑文虽残破不全,仍可见“诗事父兄”“克孝克弟”“勤俭成基,谦和世故”等儒家教化用语,并引《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足见汉文化对云龙边疆地区的深远影响。此类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献日渐消亡,亟需引起文物部门与地方社会的高度重视,开展抢救性保护与系统释读研究。如果说李公墓残碑反映了儒家文化在云龙地区的传播与影响,那么下坞村的那氏墓志,则为我们从白族内部迁徙与地方社会整合的角度,提供了十分具体的实物证据,下坞村《那崇姑墓》言:

太那氏讳崇姑,太和人氏,迁居云龙丹梯邑,国建公之令媛也。

“太”为碑文中对女性长辈的尊称,那氏是滇西白族大姓,集中分布于大理、洱源一带,名崇姑,“太和”即明清时期大理府太和县,所在今大理古城及其周边坝区,是历史上白族最核心、最古老的聚居中心之一。“太和人氏”表明其族属、家世、文化根源均属于大理核心区白族社会体系,并非外来族群或汉族移民,“丹梯邑”即清代云龙州境内的丹梯村,是历史记载中典型的白族聚居村落。“迁居”二字清晰说明,墓主那氏家族并非世代居住云龙,而是从大理太和地区迁入云龙丹梯定居。

据雍正《云龙州志》《云龙记往》记载,明代改土归流之后,朝廷强化西南边疆管控,大理太和、喜洲等地的白族依托盐业、商贸陆续迁入云龙不在少数,董、杨、段、尹等大族定居盐井沿线村落,盐业是白族迁入云龙的重要动因^[12]。现有文献多聚焦上述主流姓氏,鲜有记述那氏迁徙情况。《那崇姑墓》碑文写明墓主原籍大理太和,迁居

丹梯,以实物碑刻为改土归流后白族向外迁徙的历史补充了一个具体姓氏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文献记载的不足,让我们对云龙地区白族来源与族群构成的认识更加完整。

结语:

本文依托云龙清至民国墓葬碑刻,以语言接触理论剖析碑刻词汇、句式特征。研究表明,汉文碑刻中多处留存白语底层元素,是汉白语言长期双向融合的体现;碑载建桥史、白族迁徙等内容可补充地方史料,完善滇西族群发展脉络。这批碑刻记录着民族交往融合的过往,也为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研究提供民间文献佐证。

参考文献

- [1] 杨益清.大理市收集的四方大理国末期的碑刻[J].考古,1987(09):788-795+802.
- [2] 简启贤.爨碑用韵考[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3).
- [3] 王锋.方块白文的历史发展和现状[C]//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辑).1994:231-243.
- [4] 赵敏.云龙县白语祭文调查[J].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2017(00):467-472.
- [5] 谢潇,谢道辛.云龙土司考[J].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2017(00):263-282.
- [6] 杨正文.明清时期传入少数民族村落的汉文文献文类考察——以攀枝花迤沙拉村的墓碑、墓志与族谱为例[J].民族学刊,2024,15(06):119-129+142.
- [7] 云南省云龙县志编纂委员会.云龙县志[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2.
- [8] 张锡禄.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整理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3.
- [9] 赵金灿.鹤庆白族的亲属称谓[J].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2017(00):473-481.
- [10] 徐琳,赵衍荪.白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 [11] 云南省云龙县人民政府.《云南省云龙县地名志》[M].1996.
- [12] 赵杰翔.以盐为媒——对云南省云龙县盐业发展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5.011

作者简介:张满(2001.04-),女,白族,大理云龙、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白族语言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大理云龙民间墓志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025Y0704)。